

SHENGSHI CHENSILU

阎长龄 赵敏



盛世沉思录

一本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书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SHENGSHI CHENSILU

阎长岭 赵敏 主编

盛世 沉思录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沉思录/阎长龄, 赵敏主编.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21-695-2

I. 盛… II. ①阎…②赵…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9561 号

盛世
沉思
录

阎长龄
赵敏
主 编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号鸿儒大厦 B座
邮 编	100044
电 话	(010)68320825(发行部) (010)88361317(邮购)
传 真	(010)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2.75
字 数	228千字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9.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69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于光远

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有一场“杂文时代是否已经过去”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我当然算不上什么角色，但当时我在延安，而且是著名的《轻骑队》——一张贴在中央青委山下的墙报的发起者之一，对这个杂文史中的“经典争论”不能不关心。轻骑队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青团的一个组织，它的任务是专门揭露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不良现象。我们就是借鉴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办起这张墙报的。在发生这个争论的时候，我认为争论产生的本身就说明杂文时代没有过去，而且就是狭义的鲁迅式的杂文时代也没有过去，这一点到今天看得就更加明显了。

同时，我认为杂文的特点是“杂”，不但“对象”杂，而且“体裁”、“风格”也都杂。我想编者所选文章一定既包括鲁迅式的杂文，它像举起匕首那样的战斗，也包括其他能使人获得多方面教益的，思想深邃、语言清新的杂文的其他形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我写过关于“笑”的超短文。

我说——

“笑有多种多样。有些笑，我不喜欢也不会。有些笑，我不得已而为之。此处说的笑，指的是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自然而然发出的笑。它是智慧的表现。面对貌似强大而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上面这种作为智慧的笑，又是真理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的显露。它当然是一种力量。”

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用笑送走了骑士制度。我想在中国会用笑送走那些使人讨厌和愤怒的东西。历史会是这样的。

就写这些吧。

序言

杨
子
才

一次，我见到一位常写杂文的朋友，问他有何新作，他回答说：“搁笔许久了，写杂文难着呢！”追问原因，才知道他为了某篇杂文，被人好一番开导，劝他改换门庭，及早撂下那支秃笔为好。

我的朋友还谈及他之所以受到这份“厚爱”，乃是因为有人读了他的那篇杂文，不知怎么总往自己头上想，最后干脆来了个“对号入座”；文中本来泛指一般的，他看做是专指他本人；原来只不过是比喻劝勉的，他判断为指桑骂槐；那些关于历史典故的引述，他认定是借古人揶揄他这个今人；笔底柔声细语指出的个别缺憾，他说那全是出言不逊和意欲中伤……就这样，你说得再多再委婉，也如同往铁疙瘩上浇水一样，压根儿不被吸收。

我的朋友还说，还有个别比“对号入座”者态度更生猛的人，干脆把杂文看做无益有害之物。比如，一位先生就以博学者的口吻说：“天底下有各种叫声：鸡啼唤人早起，狗叫令人警醒，布谷于初夏催耕，蟋蟀在三秋促织，灵鹊先知可以报喜，鹦鹉能言懂得迎客；唯独这写杂文的，说东道西发出一片噪声，就像塘畔蛙鸣，静夜扰人清梦。”这位先生的结论是：杂文这劳什子最好莫看、莫听、莫载。

好一个“塘畔蛙鸣”！好一个“莫看、莫听、莫载”！

事情恐怕还不能如此了结。就中国而言，就现代而论，杂文日渐兴盛，已经六七十年了。它奖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独特功能，早已为国人所公认。如果此类有益世道人心的文字可以斥之为“蛙鸣”；那么，历代文献中的“蛙鸣”就太多了：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是“蛙鸣”；东汉梁鸿的《五噫之歌》是“蛙鸣”；晋代鲁褒的《钱神论》是“蛙鸣”；唐代柳宗元的《蝜蝂传》是“蛙鸣”；杜牧的《阿房宫赋》是“蛙鸣”；宋代欧阳修的《五代

史伶官传序》是“蛙鸣”；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是“蛙鸣”……推而广之，世上一切具有说理、问难、解剖、褒贬、讽喻、劝诫、感言等性质与特征的诗、词、曲、文、赋，无一不是“蛙鸣”。对这诸多“蛙鸣”都“莫看、莫听、莫载”，今世和后世的读书人所拥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少了么？

把写杂文的说成是“塘畔蛙鸣”，尽管这比喻意在贬损，但过去和今天的事实已一再证明，自然界没有“蛙鸣”，就没有月白风清的夜晚，就不成其为世界；社会生活中没有“蛙鸣”，就没有趋于真善美的文明与进步，同样不成其为世界。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起了春秋时郑国“不毁乡校”的史实。那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但有人也把这种议论视为“蛙鸣”，主张毁掉乡校杜绝“噪声”。可子产却说：“人（们）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捐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由于子产允许人们议论风生使郑国大治。为此，后人作古风一首赞曰：“不毁乡校郑国治，美誉笑骂皆乐知。自古居高听卑少，民之訾议是吾师。防川容易防口难，只堵不疏枉筑堤。唯有忠善能损怨，威压刑罚岂足恃？民之所恶即易辙，民之所善笃行之。”（《萤窗咏史诗》）

看来，还是鲁迅说得中肯：“杂文很像显微镜，边照秽水，边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至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因而它是不可缺少的。



目录

张心阳	“小戈”的羞愧.....	001
王春来	吴晗的悲哀.....	004
王春瑜	“万岁君王只钓龙”.....	006
何满子	“内圣外王”述义.....	009
毛志成	要敢于追问历史的恶根.....	012
柳士同	生活在穀中.....	014
雷 颐	罗斯福与“扒粪者”.....	016
徐 强	排队割阴茎.....	019
陈四益	当面奉承（外一则）.....	021
牧 惠	草堂随感录（三则）.....	023
梅桑榆	做戏.....	026
刘心武	掬妥诚信.....	028
徐怀谦	盛世下的沉思.....	030
屈超耘	宋濂的心理学.....	033
徐 强	历史的碎片.....	035
王重旭	贾桂的奴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038
徐迅雷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040
郭松民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043
郭大芳	“皇权专制”与“非皇权专制”.....	045
刘诚龙	民主选举当皇帝.....	047
张雨生	毛泽东敢说自己“放空炮”.....	050
魏得胜	花样右派.....	053
王彬彬	说“民心”.....	056
安立志	财色辨证.....	060
陈泽群	批示.....	063
邵燕祥	国在山河破.....	065
王得后	代表的身份问题.....	067
吴 钩	专制体制下的道德问题.....	070
魏文彪	官员面子与奴才意识.....	072
从维熙	刍议“引咎辞职”.....	074



陈 仓	学会破译假话.....	076
沈 栖	“收银机”的启迪.....	078
黄一龙	愚公移山：移到哪里.....	080
柳士同	哈佛儒生的梦呓.....	082
宋志坚	“野心家”纵横谈.....	084
张孟志	“善政”的成本.....	088
高压锅	妓女哲学.....	090
刘洪波	人道基准.....	092
韩少功	伪小人.....	094
张 扬	刘绍棠的“妙语”.....	096
瓜 田	贪官与小偷之比较.....	098
祝 勇	论雷峰塔的重建.....	100
孟 波	寂寞的“左拉”.....	102
蒋子龙	人性和狗性.....	105
赵 牧	三个画圈的人.....	107
鄢烈山	“爱国贼”.....	109
吴 非	“空口道”.....	111
魏明伦	灶王碑.....	113
曹团元	马寅初何以在经济界享有盛誉.....	114
冯骥才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116
郭兴文	关于“指鹿为马”的学术问题.....	118
单鸿恩	出卖灵魂的“叫好儿”.....	121
牟丕志	找准位置.....	123
符 号	名目之感.....	125
侯国平	萨达姆让我惭愧.....	127
郑连根	“诏狱系统”与“意图伦理”.....	129
符 号	“起盗心”的追寻.....	132
黄 波	“精英”之无耻，是为国耻.....	134
雷抒雁	残思断想.....	136
魏得胜	谁活得轻松.....	139



目录

狄 马	谁跟谁善良.....	141
于光远	侃侃味觉.....	144
兰 楠	诡辩录.....	145
蒋子龙	造脸工程.....	147
乐 朋	有一种爱让我们堕落.....	149
毕淑敏	优点零.....	151
刘 齐	愚蠢指数.....	153
王乾荣	“新男性”	155
戴宇威	现实中的“死魂灵”交易.....	157
乐 朋	好赌的中国人.....	159
洪巧俊	我们的思想能走多远.....	161
叶延滨	吃竹笋屙背篋.....	163
南 雁	“正处级”	165
陈 仓	俗语里的复仇“密码”	167
余秋雨	小人.....	169
吴兆民	狐狸吃到葡萄以后会说什么.....	171
郭大芳	阿 Q 的斗争精神.....	173
龙相公	阿 Q 再生记.....	175
侯国平	凤姐的学历.....	177
林 鸣	窗下猫语.....	179
杨子才	林间童话.....	181
牟丕志	龟兔赛跑之后.....	183
王 蒙	牢骚满腹·雄辩症.....	185
刘 征	叹五更.....	187
毕诗成	GDP: 俺的自白书.....	189
沈 栖	“文革”幽灵的自白.....	191
魏剑美	我的复古主义理想.....	193

“小戈”的羞愧

张心阳

这里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小戈”，并非对他有什么不恭不敬，而是在当时，他确实还是个“小戈”。

1980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政治局正式委员，时年仅49岁，是政治局所有成员中最年轻的，尤其是对于那帮七老八十的同僚来说，他无疑是个小伙子。也许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上，所以他才感到官场上的很多做法很不合他的“新思维”，倒了他的胃口，并因此便产生了羞愧感。

初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对开会时的人座，他不禁觉得怪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都会不假思索地各就各位，既不会是前一个，也不会是后一个；即使有人缺席，那位置也只能空着，排在后面的人绝不会挪到前面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排列的座次：“勃列日涅夫右边是苏斯洛夫，左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是政治局委员的先后排名，离勃氏坐得近的，名次靠前，权力较大，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离得远的，权力、身份、地位逐一次之。他“小戈”当时是最年轻、最新当选的委员，自然要位居老末了。

会议期间，他常发现会议主持人说着说着就“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戈尔巴乔夫没有明说这个主持人是谁，但根据苏共高层“谁权力最大谁主持会议”的惯例，这个主持人自然就是“一把手”勃列日涅夫了。

再就是总有人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往哪儿跑？自然是往“一把手”身边跑。特别是契尔年科，别以为他是个政治局委员，其实也就是总书记的“大秘”。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着公文：“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给你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所有这一切都让“小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使得他不禁感慨万千：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笔者已在相关的文章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是处于复杂历史时期的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成长于官僚体制下有意于改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企图改革而又不甘摆脱官僚体制的人。尽管从他骨子里还透着一股官僚的专制的气息，但他没想到让他仰慕已久的政治高层的“宫廷游戏”会演成这样，丑陋到如此地步，并且让人人都觉得习以为常。

在很多人看来，高层次的人开高层次的会议，一定会是高效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何曾想到，这会议的主持人就是个庸才，别看他位置那么高，到处显示他的能耐，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水平，就连瞎咋呼都还出错。不是吗？会议刚开了个头就跑了题，东拉西扯，胡说八道，让人不知所云。而其他也就这么附和着，主子爱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块儿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主子愁大家一起陪着愁，主子笑大家一块儿陪着笑，全随着主子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这种高层会议和冬天里的农妇太阳底下纳着鞋底说闲话有多大区别呢？戈尔巴乔夫为此而感到羞愧，显然是感到宣传机器总是在不停地吹嘘“我们的党是坚强有力的党”，而实际上大相径庭；宣传机器总是把勃氏吹得神乎其神，而实际上往好里说，才智也仅是中等。这一切不仅是有负人民厚望的，也大大地欺骗了人民群众。作为党核心层成员，他能不为之羞愧么？

戈尔巴乔夫还很看不惯那种总爱在“主子”面前跑来跑去的人。是的，既然是事关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一切都应该由集体决定，而不应该只由个别人私下一商量，或工作人员通过揣测主子的意图就决定了。可实际上很多事情就这么决定了，而且还把这种事情做得这么明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也不避讳。而那跑来跑去的人，总是把自己扮得很忙碌的样子，总是搞得与领袖很亲近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是领袖的心腹，才最让领袖信得过。这种当着众人的面在“领袖”面前卖乖讨巧其实是一种无耻，可在党的高层有人却偏偏把这种无耻当光荣，以致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来。党内的庸俗关系应该说以此发端。

开始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理解，便趁四周无人的时候问他的“伯乐”、离他最近的人安德罗波夫，怎么会是这样子？老安的回答似乎是答非所问，但颇得精髓，他一字一顿地告诉“小戈”：“应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即勃列日涅夫）。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

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僚们按着尊卑排座次也好，跟着“领袖”后面瞎起哄也好，由亲臣替“领袖”作决策拿主意也好，抑或在“领袖”面前争宠卖乖也好，全都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需要，换句话说，国家稳定不稳定，并不在于决策正确不正确，也不在于人民生活富裕不富裕，更不在于人民意志能否得到表达，而全在于“领袖”的权威是否得到维护，领导人的座次是否排得得当，大家是不是按照“领袖”的口径说话，是不是保持着“说话一个声音，行动一个步调”。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国家和政权就稳如泰山，社会就发展进步，甚至全世界都歌舞升平。

是的，按安德罗波夫的说法，诸如排座次的问题，上电视先后的问题，能否保持与“领袖”一个腔调说话的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就要认真地、大胆地、扎扎实实地把它做好。而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做得不错，比如面对“领袖”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大家都一味捧场；又如会议上的座次，公众场合的露面前后顺序，谁也不会向前多越一步，就像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观察到的，他们总是做得那么自然、老到。而戈尔巴乔夫却为之羞愧，这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庸俗、市侩、虚伪的做法对这个党的重要性，还需要不断地长期地经受这种无耻的锻炼，只有使自己的脸皮真正厚起来，对这种庸俗的做法麻木了，就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了，从而也就有了实施独裁专制的资本了。

在阅读有关前苏联的书籍中，为“领袖”的言行而羞愧或羞耻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用皮鞋敲讲台，这使得台下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之羞愧难当；一件是风烛残年的契尔年科拖着病体、昏头昏脑地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以致看串了行，让听众不知所云，使得人们为国家拥有这样一个领导人而羞愧。我无意评价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应该为之羞愧，但做人的羞愧之心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中国文化一向强调“羞耻之心”，孟子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这种羞耻之心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说明内心正义尚在，道德犹存；怕只怕寡廉鲜耻。这样，人们对他的羞愧之心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另一种情绪——唾弃。戈尔巴乔夫对他某些前任们所持的态度不就是唾弃吗？

吴晗的悲哀

王春来

吴晗和郭沫若有些相似：都是学者、历史学家；又都从政，官位不低，兼职不少；二人都是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从心底里尊重敬佩。

有的人说，郭沫若的悲剧在于“治学与为官的错位”。我认为郭沫若与吴晗的悲剧，不在于错位与不错位的问题，而是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能兼得。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忽冷忽热，难以适应。就拿治史来说吧，历史学家要想有成就，必须潜身史海，钩校史料，独立思考，严肃认真，挖掘史料深层的内涵，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史见，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探索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史实为依据，按迹循踪，不能稍加穿凿，方能见出史学家的史胆、史识、史德、人格与个性。

从政为官者，其职能是夺取政权后，千方百计地巩固政权，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政界习惯于紧跟照办，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运动一来各级领导必须表态，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不得有半点犹豫。这是对各级官员的起码要求，必须做到的第一步。

“反右派”一开始，吴晗就积极参战，猛烈开火。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成了一个反右派的大会，在会上吴晗高喊着：“我愤恨，我控诉，”走上了大会主席台，批判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相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党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在批判罗隆基时，吴晗一口气点出了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等十七个人的名字。由此可看出吴晗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的洪流中。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人物传记，第一个本子叫《明太祖传》，出版于1944年6月；第二个本子叫《朱元璋传》，1949年4月出版。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越唱越高，对农民起义军的评价日益升温，再加之毛泽东对《朱元璋传》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吴晗就一改再改。在1964年版本的《朱元璋传·自序》中说：“第一、二个本子内容都有许多错误，有些地方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拿来第一、二个本子来和1964年版的《朱元璋传》一比较，就看清楚了吴晗所说的严重错误是什么了。他将朱元璋嗜杀成性、狠毒无比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删掉了，将青年史学家出于正义激情对朱元璋阴险心态描述删除了。这样删削的目的是为了给出身农民的朱皇帝涂脂抹粉，但却减弱了《朱元璋传》里的才气豪情，丢失了不少青年史学家独具慧眼的历史穿透力。就因为配合政治斗争适应时代的需要，把一本好端端的人物传记，改得面目全非了。

吴晗的官越做越大，国内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多，吴晗紧跟运动，忙于表明态度。1959年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吴晗不久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发不可收，于是又写出了《论海瑞》，写好后把稿子交给胡乔木过目，胡忙于到庐山开会，此稿未发出。等胡回京后，告吴晗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根据此话，将《论海瑞》进行修改，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

由春到夏，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吴晗头脑中储存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信号没有丝毫变化。庐山会议后他又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应当说这是遵命文学，仍属于政治运动之作。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江青一伙政治野心家相中了《海瑞罢官》，认为它可作一枚炮弹，炸平夺权篡党之路。吴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心一意为配合政治运动的剧本，却突然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就连他自己也成了这个反革命团伙起手之时的“祭刀人”！这是吴晗的悲哀？

“万岁君王只钓龙”

王春瑜

“万岁君王只钓龙”，是明初著名才子解缙拍朱元璋马屁诗中的一句。这里，不妨权且抛开这首诗的本意，把“钓”字的含义，归结于古往今来不少人沉迷其中，乐此不疲的沽名钓誉的“钓”。若然，对于历代皇帝而言，说此辈“万岁君王只钓龙”，应当是最恰当不过了：皇帝“老子天下第一”，富有四海，声名如雷贯耳，远播异域，要说钓名，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攀龙，把自己美化成龙的化身，在万岁、万万岁的山呼声中坐上雕着金龙的第一把交椅，鼻子朝天，君临天下。

万岁本来是个普通名词，类似俄语中的“乌拉”，人们在欢呼时，情不自禁地迸出这并不神圣的两个字。但是，秦汉以后不同了，“万岁”与帝王画上等号，几乎成了皇帝大词典里的专有名词；除了穷乡僻壤不省世事的小民，偶尔会将小孩起名为张万岁、李万岁之类，并有极个别人，后来出了名，居然不改，如唐朝就有个武将叫史万岁的。就绝大多数人而言，对“万岁”一词谁敢僭越？除非他想屁股开花，让吃饭家伙搬家。1979年，尚属粉碎“四人帮”后的“乍暖还寒”时节，我斗胆写过一篇《“万岁”考》，就是说的帝王怎么和“万岁”贴在一起，成了让人诚惶诚恐，不敢仰视的圣物。在该文的附记里，我写过一段话：“在中国古代史上，‘万岁’喊了两千年，产生过多方面的巨大影响。要彻底把‘万岁’的来龙去脉研究清楚，涉及多方面的学科，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专著。浅学如我，显然是不能胜任的。好在‘砖’已抛出，我企待着‘美玉’接踵而来。”惭愧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马齿徒长，依然学浅；但1999年秋，在《百年潮》上，终于看到了一块“美玉”，这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雷颐先生写的《“万岁”还可以续考》。他敏锐地指出，毛泽东本来无人喊他万岁，后来则一片万岁声，到“文革”期间，更发展到万岁声不绝于耳的地步，考证其来龙去脉，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我以为雷颐先生此说极有见地。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决制止别人喊他“万岁”，他很厌恶把他与封建帝王混为一谈。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也就是从西

柏坡动身去北平之际，毛泽东曾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但在“万岁”的问题上，毛泽东显然并不了解，李自成早在西安时，名曰称王，实已称帝，当了“万岁”爷，刚刚攻破北京，百姓即称“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甲申纪事》，赵士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笔者写的《李自成登极辨》、《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见拙著《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中心），此处不枝蔓。

重提这些故实，我纯粹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前不见古人，后每见来者，念历史之相似，怎不令人感慨！

我三岁记事，童年在盐阜抗日根据地长大，参加过儿童团。我清楚地记得，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无论是在小学里，乡民大会上，还是新四军战士、解放军战士的集会、演出活动中，管窥所及，没有看到“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也没有听到过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写信询问现在盐城市定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参加革命，一直在盐城地区从事文化工作的家兄王荫，请他回忆并就近向一些老同志调查此事。后来他来信说，据他回忆，并请了六位老同志回忆，都说1949年前从未喊过“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家兄还翻阅了江苏省文联在1983年编辑出版的《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1941年至1949年），其中鼓词、说唱、戏剧等文艺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口号。但是，葛石同志说在抗战胜利前后，农村开会时，喊过这个口号，还在墙上写过，但具体时间、地点回忆不清楚。张玉良同志回忆说，他1948年在解放军34师当文书，后来在渡江前的誓师大会上，战士们已高呼此口号，但同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在解放南京、上海后，战士与百姓，也喊过这三句口号。而新中国成立后，只能喊毛主席一人“万岁”了。我请著名出版家戴文葆老学长转请新四军老战士陈允豪同志回忆此事。陈老在“二战”期间，曾任《盐阜大众报》记者，也曾在游击区从事过艰苦卓绝的开辟根据地的斗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即读过他的回忆录《征途纪实》及《雪地上的血迹》。陈老很快来信说，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淮阴战斗中，他随军爬城墙进城，看到居民墙上有用毛笔墨水新写的三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新四军万岁！”

我曾写信向南京军区的新四军军史专家丁星同志求教，承蒙他不但回了长信解惑，还复印了相关资料。丁老认为，“党的‘七大’可能是个分水岭。‘七大’以前，至少在新四军文献中从未见过‘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甚至连‘毛主席’这个称呼也是后期才出现的（按：抗战初作家沙汀写的《记贺龙》，即曾记述贺龙提到毛泽东时，称其为老毛），前期称‘毛同志’‘毛泽东同志’，

电报只称一个‘毛’字。‘七大’会议上，朱德的军事报告（即《论解放区战场》）最后有几句口号，如‘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万岁’，第二句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按：第一句口号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万岁’，第四句是‘团结一切友军打败日本侵略者’，末句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丁老还在信中指出：“解放战争时期，喊或书写‘毛主席万岁’，在各解放区肯定已经很普遍了。我军再次解放两淮时，我就在淮安城楼上用刷子写过‘毛主席万岁’。”丁老随后还附了一份汤洛写的《毛主席万岁！》一文的复印件，原刊于1948年2月19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此文介绍胡宗南侵犯延安后，国民党士兵将墙上的“毛主席万岁”标语，改成“蒋主席万岁”，但第二天，“蒋”字又被老百姓改成“毛”字，这样改来换去连续几天，最后游击队员将敌人看守标语的哨兵杀死，终于保住了“毛主席万岁”这条标语。应当说，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饶有兴味的故事。丁老认为，“当年，在很大程度上，老百姓是将‘毛主席万岁’作为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拥护来表达的。这与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一个人的祝颂有所不同。”

但是，“万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同的地点、场合，不会完全相同，老同志的回忆，也会因人而异，产生差别。例如，我请教解放初曾任华南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曾彦修（严秀）同志，他说他三十年代去延安，在延安生活、战斗过多年，在各种场合，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未见过这样的标语。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口号越叫越响，而且不允许再叫朱老总万岁。有位老理论家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后叫这样的口号，是当时受前苏联的影响非常大，叫惯了“斯大林万岁”，叫“毛主席万岁”也就似乎理所当然了。

看来，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个历史的转折点。我在上中学时读何其芳歌颂开国大典的长诗，其中说游行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有次我与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聊天，问及此事，他说他当时在军管会工作，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下面游行队伍中传来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相当整齐，显然是事先组织布置好的。

看来，系统地研究“毛主席万岁”的来源，是很有意义的。但以某一一人之力，恐难奏效。我希望有人牵头，组织古代史学者、党史工作者、老同志、档案工作者，共同完成一部前所未有的著作——《中国“万岁”史》。不才翘足而待！